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资助
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

21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包智明 赵旭东 主 编
刘 谦 龚浩群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

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

21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包智明 赵旭东 主 编

刘 谦 龚浩群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21 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 包智明、赵旭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139 - 3

I. ①人… II. ①包…②赵…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98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014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能够从最初酝酿到顺利召开，跟会议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赵旭东教授之前写作的一篇论文有关。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最初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2012年第11期上。在文中，他提到了以中国意识为核心的人类学在三个世界中的不断展开。这三个世界即是指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与现代世界。他原计划召开以这三个概念为核心的三个主题会议，这样可以使中国人类学的特征得以凝聚和凸显。恰好在2014年秋天他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经费的支持。他在申请之时，觉得应该先从现代世界这个论题谈起，再逐步回到自身的社会中来，便毅然决然把此次会议的题目确定为“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Anthropology, Modern World,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并决定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征集会议论文之时，他曾经专门写了一份会议主旨的说明，可以说有些与会者是受到这份文字的吸引而来参会的，因此不妨将这段文字罗列在此，便于查考。

二十一世纪，乃是一个文化转型的世纪。面对越来越清晰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面对由新媒体所带动的文化讯息传播和交流速度的日益加快，同时还有，面对由媒介的新物质性以及社会性所导致的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呈现。面对所有这些，使得人类学自身的处境与在二十世纪之初人类学发轫之时的样貌以及所面临的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执此之故，今天的人类学家承载了一种不同于既往时代的文化重建的使命，这种文化重建的根本是在于如何在世界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有意识地凭借一种知识建构的主体性，而去重新定位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家在整个人类知识发展体系中的作用。面对多样性的世界文化，面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人类学必须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努力为自己找寻到一种更为恰当的定位，这既是一种世界性的学科的定位，同时也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有的文化定位。

人类学家在理解文化方面的独特视角，使得人类学家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变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沟通与打破各种人为的社会与心理边界的作用，同时，人类学家对于文化及其差异性的包容和欣赏态度，恰恰也在不断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带来越来越完整以及越来越细腻的化解途径。人类学正担当着一种在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顺畅沟通的粘合剂的作用。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转型的世界，我们需要为这种新的粘合剂的发明找到一种新的配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有八场次三十六位报告人报告了会议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本会议文集分三编收录了其中十五位报告人提交的会议论文。

第一编为“文化转型之可见”，收录了七篇会议论文。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以“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基于中国西南地方文化抒写讨论”为题报告了他的研究。在他看来，近些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出现了不少“复振”的案例，从现实的历史、流动的区域、再现的遗失、真实的传说等四个方面对“文化抒写”进行叙事。他认为，这些源于当地人的主动性与文化自觉，实质上隐含着文化的重构或创新，效果上可能更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与保护，也有利于新的文化表达范式的产生，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

华中科技大学孙秋云教授在其题为“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报告中，基于他们团队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指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

之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改革现有的地方台电视传播体制和机制，释放地方电视台在乡村基层民众社会生活传播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于推动乡村基层社会的科学治理非常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张慧博士以“可持续城市社区的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为题汇报了她与莫嘉诗、王斯福等人合作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在昆明的四个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居民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公共信任、社区归属感、冲突解决与社会融合等问题，并通过最基层城市社区的运行和实施情况分析社区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指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和通过拆除、搬迁强制进行的城市化一定会遭到居民更大的抵制，这与不信任的累积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政策的不确定性相连，同时，新政策、新规划对基层意见反馈的延迟和不畅会加剧这种矛盾。

安徽大学王云飞副教授在其题为“社会变迁中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路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过程中，这一变迁的主要标志便是城市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得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变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破坏了原有的支持系统，由此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不能通过传统家庭和家族的支持系统来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困难。由此他指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必须建构由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等互动形成的支持网络，同时重视以家族支持、邻里朋友等非正式的天然社会支持系统。

内蒙古大学博士生陈红以“牧民与其本土知识体系的再思考——基于西藏当雄牧区的人类学考察”为题进行了报告。她发现：一方面，在国家牧区话语中，牧民仍是被发展和扶贫的对象；在另一方面，本土知识体系则给予了牧民更多的自信。她指出，国家牧区话语和牧民本土知识体系在村落社会中相遇时，互动中形成了对话机制，双方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变。牧民主要依靠的对话条件是其所掌握的本土知识体系。在对话过程中，当牧民本土知识体系被过多忽略或否定时，将会出现国家牧区话语与牧区现实相互偏离的现象，其偏离的程度取决于牧民本土知识体系与国家牧区话语体系之间的融合程度。

贵州财经大学段丽娜教授的题为“现代化背景下的贵州民族文化的

保护与发展”的报告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影响下发生的质性的改变。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传统文化迅速消失，状况令人感到担忧。如何从传承弘扬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贵州民族文化，对于贵州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至关重要，并认为保护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对于传承世界文明有着积极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闯编辑以“从‘人’到‘族’：‘归族’后克木人的认同与发展研究”为题对于云南布朗族中的克木人族群认同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报告。他分别从官方史籍中克木人的失语、口述史中潜在的二元结构和实际社会互动中的认同依据进行分析，认为被认异的记忆与语言决定了克木人的族群边界，并在认同——被认异——强化认同的过程中得以维系。而当代克木人日常生活中的身份意识与国家帮扶下的文化展演显示了作为族群社会背景下的“人”与作为民族国家系统中的“民族”间的内在张力。

第二编为“文化转型之隐喻”，收录了四篇会议论文。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题为“连续与断裂：我国传统文化遗续的两极现象”的报告中，首先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西方文明的断裂性着眼提出问题，他注意到了维科《新科学》中所提及的西方社会的转型首先是一种人的转型，是通过对人的重新分类而实现的对于他者的排斥。而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连续性使得文化的损失表现得最为严重，所谓的文化遗产大多不在地上而在地下，这是由大一统的相互剿灭所实现的文化不能够留存下来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在任何历史性社会转型中，“人的转型”是根本性的，西方的历史为我们刻划出一条鲜明的历史痕迹。在人的历史演化中，暴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借助手段，并以“污名化”予以身体性惩罚和社会化排斥。我国的历史自有其特质，“连续”与“断裂”并不总是同趋性的，在社会转型中，王朝更替与文化传统表现出相违的现象，出现“连续中的断裂”现象。

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的题为“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的报告，不同于以往将乡村都市化作为社会转型过程所进行的宏观研究，从人类学角度将乡村都市化作为“文化转型”的过程对其进行了“微观阐释”。因此，他将文化内化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具体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分析和讨论了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对于都市化与

文化转型的关系，他认为，事物双方的影响常常是相互的，都市化在造成文化转型的同时，文化转型同时也型塑着都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中国的乡村都市化无疑决定着其进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

文学营销研究所的王革培先生以“文学人类学需要‘文学营销’”为题，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文学如何与营销相联系，又如何与人类学有关联。他认为，现有文学人类学理论之所以没有“文学营销”概念，是因为没有从技术角度看待文学，文学这门技术区别于人类为节约生产成本而产生的那种通常技能，文学主要负责在人类社会中如何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他通过对文学营销概念的阐述，试图对文学人类学理论加以补充，并试用“文学营销”中的产品概念分析文化转型中文学所起到的降低转型交易成本的作用，继而提出了文学营销视野下建立“世界文学”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富晓星博士题为“‘主位诉求’的志愿服务模式探究——以流动儿童为例”报告了她与刘上、陈玉佩合作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在我国发展了30余年的志愿服务仍处于立法缺乏、规范不足、管理不善的多元探索阶段。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指出，人类学强调对于主体的尊重和发展，与服务对象一起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应用和建构。他们以流动儿童为例，基于3年的大学生支教田野，发展出了一套原创的志愿服务模式：以“主位诉求”为核心概念，发展出适合流动儿童诉求的“递进”行动策略并采用志愿者参与观察、儿童后测日记与课堂小短剧、儿童所拍照片与“心里话”信箱的“三角验证法”确保了其“主位诉求”的信度和持续发展。

第三编为“文化转型之于人类学”，也收录了四篇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在题为“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的报告中指出，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意味着一种跟各文化关联在一起的转型人类学的出现。这是以自我的文化体验为判准的一种文化内生的人类学，它的基础在于去深度考察那些为西方现代理性所切断联系的文化的逐步恢复与重塑。他进一步指出，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人们认识到人不再是一种功能论式的理性的再生产模式的造物，它还是一种能动的自我的生成机制，它为激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并使之与理性有了一种最为完美的结合：那就是告别单纯的反思，直面多样性的文化的表

达，并在欣赏和培育文化情调中去拒绝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与嘲讽。

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涛博士的以“制造‘人’：一项关于人格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为题的报告，通过归纳等级社会中关于人格的等级—特权范式和民主社会中的权利—义务范式，分析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对于人格的规定及其对应的支配方式。他试图指出，个体在民主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已被界定为抽象的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其代价实际上是放弃支配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人作为自由存在的价值被剥离了，人格还原为属性、关系和价格等外在的并且可以被使用和转让的东西。由此他认为，建构理想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应该是个体拥有终极价值并保有普遍而有限的自由意志。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顺峰则以“论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局限及可能进路——以民族习惯法为分析对象”为题报告了他对民族法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的一些思考。他以西方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对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中的固有局限性予以揭示，并提出了未来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可能进路。他指出，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中面临着理论与方法上的诸多挑战，虽然西方的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经验样本，但中国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还是离不开对于中国场域实践的充分关注。

浙江师范大学辛允星博士在题为“‘文化改良主义’刍议——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思考”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问题上，学界有一种观点倡导以“文化变革”先行，同时又十分强调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他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文化改良主义”，并指出，这种思想观念发端于清末民国时期，之后演变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指南，至今还有着很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他认为，透过“文化改良主义”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诸多理论困境，其中的核心表现就是对“文化整体性”理论的漠视，以及对“文化嫁接”工作的盲目信任，而对这些理论话题的剖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命运。

在这次研讨会上，八位专家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画龙点睛的评议。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经过两天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人类学走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应该在一种中国意识的引导下展开对于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以及现代世界这几个区域范围的人类学研究，以此来构筑一种中国社会中可以发挥其作用的有现实感的文化转型人类学。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次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圆满成功。

包智明

2015年11月8日

目 录

第一编 文化转型之可见

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基于中国西南地方文化

抒写的讨论 秦红增(3)

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

——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

实地调查 孙秋云 王利芬 郑 进(17)

可持续城市社区的形成:一个

自下而上的视角 张 慧 莫嘉诗 王斯福(30)

社会变迁中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路径研究 王云飞(50)

牧民与其本土知识体系的再思考

——基于西藏当雄牧区的人类学考察 陈 红(63)

现代化背景下的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段丽娜(74)

从“人”到“族”:“归族”后克木人的认同与

发展研究 李 闯(92)

第二编 文化转型之隐喻

连续与断裂:我国传统文化遗续的两极现象 彭兆荣(117)

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 周大鸣(132)

文学人类学需要“文学营销” 王革培(142)

“主位诉求”的志愿服务模式探究

——以流动儿童为例 富晓星 刘 上 陈玉佩(156)

第三编 文化转型之于人类学

人类学与文化转型

——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

哲学的回归 赵旭东(185)

制造“人”：一项关于人格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罗 涛(224)

论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局限及可能进路

——以民族习惯法为分析对象 刘顺峰(241)

“文化改良主义”刍议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思考 辛允星(258)

第一编

文化转型之可见

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基于中国 西南地方文化抒写的讨论

秦红增

随着时下中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文化”也渐渐进入发展的核心视野。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俗文化体验,方兴未艾的乡村生态旅游,茶道、花艺、建筑等独特艺术分享,不只是为区域或地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得“文化消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或休闲中成为常态。其在主观上满足了现代人,尤其是城市人对“异文化”的好奇或着迷心理,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味,客观上则促成了文化的“复振”,如地方文化的复兴、重构、建构等。但由于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长时期的救亡图存、革新富强等运动,使得地方文化一直处于“断裂”状态,以致时下的文化“复振”中,不得不掺杂许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甚而“虚构”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对文化的任意“抒写”,因而在赢得地方文化空间拓展的同时,也导致文化的滥觞,引发了文化“真实性”的质疑与讨论。窃以为,不应过多地纠结于“真实”与否,因为社会的变迁场景本身就是最为真实的存在,而是应当对这些“抒写”现象进行深度反思,以促使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更好地增长,实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愿景。同时,在学理上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认真总结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志撰写范式,以有利于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

一 “写文化”与文化抒写

通过认知“文化”来达到对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是人类学学科的主要目标。基于文化本身天然的“复杂”性,人们又创造出许多范式或工具,来达到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民族志”是表现

这一认知的基本载体。有学者按撰写方式把民族志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所谓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志；先有民族志，很久之后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其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其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即如何来“写文化”，而不是研究“文化”。^①

那么，人类学又是如何“涉及主体来建构知识”，如何实现“写文化”式的民族志？这便要求对具体时间、空间和行动主体的经历及其社会处境的把握。“要而言之，人类学要研究人的社会文化实践，就要带着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反思和问题意识，到目标社区去体察（参与观察）和聆听（焦点访谈）他者的处境和需求，领会和描述他者的经历，了解目标社区和结构性事件的时空场景及其过程，呈现和阐释行事者行动的意义体系和结构条件，写出好的民族志。如果没有对于主体意义、结构场景和事件过程的深刻理解，我们的研究导向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应用，都只会事倍功半或南辕北辙。”^②这也就表明“写文化”实际是一个综合性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研究者要把文化看作是研究对象主导下的动态展现，要始终围绕研究对象的行动，在其所处的特定时间、空间场景中来展开自己的文化描述。

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写文化”目标是否能够最终实现，但其所传递的撰写宗旨对丰富民族志则有着重要的启迪：文化描述实质上是文化建构即“文化抒写”；在这一整体建构过程中，研究对象变为行动主体，有着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建构能力；研究者要实现文化描述，不只是尊重，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研究对象，应具有对文化时间与空间整体的感觉

^① 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 张海洋：《好想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与认知;等等。

二 地方文化抒写的兴起

在类型上,地方文化可看作是与亚文化、非主流文化、非西方文化等与“弱势文化”相类似的概念,对应于正统文化、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等“强势文化”。从学科来看,对地方文化的重视一直是人类学的传统,起初只是为了好奇或满足殖民统治等现实需要之类的认知。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地方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典型的如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地方性知识的倡导”,注重“民族文化重构、建构”等,大有与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平起平坐之势。正因为如此,萨林斯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乐观地指出,两者是同步的,即现代科技、经济在全球到处扩张的同时,也必然有一个地方化的过程。^①

地方文化兴起主要归结于人们试图借助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来对全球化或西方文化形成反思与矫正。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积累与发展,非西方学者相关本土研究亦呈风起云涌之势。具体到中国,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边疆文化的重视,这可能与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相关联。自古以来,在中央王朝“教化”范畴内形成了两类不同的群体: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这两类的界限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以儒学为正统的文化教化里面,还是有“内外”之别:中央为正统,周边为“蛮荒”。“礼失而求诸野。”周边“蛮荒”恰恰是文化多样性最集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如何做好地方文化研究,以与正统的中原文化或儒学教化照应,乃是当前中国人类学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注重地方文化实质上是中国人类学界长期倡导“从中心看周边,从周边看中心”视野的扩展。事实上,人类学、民族学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除了大量案例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尝试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譬如麻国庆、何明等人就认为“中心”和“周边”是两个灵活的、相对的概念。从儒家文化的视角着眼,“周边”并不仅限于中国

① [美] 马歇尔·萨林斯:《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李怡文译,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